

# 新时期之初女性话语及其知识背景反思

王宇

**摘要:** 新时期之初,文学沿着人性关怀的路线必然延展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进而导致女性独特的境遇、经验的历史性出场,营造出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浪潮。但这样的出场路线又宿命般地决定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与生俱来的本质主义潜在倾向。尽管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主体也敏感到本质化、刻板性别模式/制度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压迫,但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文化语境来支持她们进一步质疑、挑战这种刻板的性别理念。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取代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本土性别语境又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本质主义思想流脉内。这一切既营造了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话语的大面积繁荣,也造成这一话语的种种尴尬。

**关键词:** 新时期之初; 女性话语; 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09)05-0091-06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渐渐渗透入我们的文化生产/文学教育中,这是30年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最令人鼓舞的成绩。现在,也许也是我们对它进行回溯的恰当时机,这当然要从最原初的时刻开始。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序幕甫一拉开,女性话语<sup>①</sup>就开始浮出历史地表。诗歌方面,1979年4月《诗刊》发表了舒婷两年前写的《致橡树》,紧接着,便有《惠安女子》(1980)、《神女峰》(1981);小说方面,1979年11月,《北京文艺》发表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紧接着,便有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第5期)、《在同一地平线上》(《收

获》1981年第6期),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百花洲》1983年第6期),等等,这批文本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女性文本的面貌,朦胧或清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了女性这个性别一直被忽略、遮蔽的独特境遇与经验,形成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第一浪潮。对这一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话语的梳理与反思,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并不鲜见,但很少人将新时期之初女性话语的浮现与这段历史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挂起钩来,那就是新时期之初的文化象征领域的“寻找男子汉”。本文力图以此为突破口,来介入新时期之初的性别文化语境,

收稿日期: 2009-06-07

作者简介: 王宇,女,福建福安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福建 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 第四十四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现代性与被叙述的乡村女性”(项目编号: 20080440727)成果。

① 这里的“女性话语”是个狭义的概念,特指具有女性独特性别立场的话语,即女性主义话语,而不泛指一切出自女作家的话语。

从而对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最初缘起的知识背景、思想文化资源作一个尽可能详尽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话语潮流后来的发展轨迹、表现形态及其内在思想根源。

## 一、寻找男子汉与寻找女人： “女性气质”的提出及其本质化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化空间中，曾发生过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男子汉的事件”，至今可能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先是日本电影《追捕》轰动一时，尤其是其中男主人公杜丘的扮演者高仓健冷峻刚毅的男子汉气概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此后“高仓健”俨然成了人们心目中旷日持久的男子汉样板。这样的男子汉被认为在现实生活、文化空间中都是极度缺乏。<sup>①</sup>一时间，“男子汉缺失”、“男子汉绝迹了”，成为街头巷议。于是，社会象征系统又悄然掀起一场以缺失焦虑为动机的“寻找男子汉”运动。到了1986年，沙叶新剧作《寻找男子汉》的上演所产生的轰动，再次显示了这一象征活动持久的社会效应。<sup>②</sup>我们知道，男子汉气概/男性气质作为个体男性自然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是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与女性气质相对的概念，并在与对方联系中获得意义。而性别差异恰恰是1949年以后文化空间的盲点。于是，与“男子汉缺失”、“男子汉绝迹了”相映成趣的是当时的人们对长期以来的“女性雄化”现象的深恶痛绝，社会象征系统在开始“寻找男子汉”的同时或更早就开始了寻找女人。而无论是寻找男子汉还是寻找女人，都非常吻合新时期之初文学人性书写的逻辑。

首先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述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解，导致对“人”的理解仅只限于其社会性而忽略了其自然性，人性所有的内容都被历史填满，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根本没有自由的间隙。人被架空为缺少本能、缺少血肉的抽象人，最后酿成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践踏。出于对这种走向非人化偏执激进话语的反拨，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话语对人性的理解偏向于非历史

的、自然的属性。张扬长期被压抑的人的自然本性、给人的食色之欲恢复名誉，成了新时期文学人性描写最重要的内容。在人性关怀的线路上，文学对性别理解更多的是基于自然的生理、心理的差异上，倾向于建立二元对立的本质化性别差异。“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一个二元论世界观复兴的时代，现代新儒学和康德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都是这一思想潮流的反映。那些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把专制主义理解为一元论世界观的结果，并进而在理论上划分出实然与应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建立一种二元论的世界图式”[1] (p. 98)。建立在心理、生理科学基础上的、对男性、女性性别差异的本质化建构，显然是这种二元论世界图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性别理念来反思50—70年代“男女都一样”的一元化性别理念，批判“无性化”、“非人化”的文化现实。

再者，新时期人道主义话语所针对的是“极左”意识形态“革命伦理”，因此，这一语境中的性别关怀话语，很容易将1949年以后的妇女社会解放话语指认为是“极左”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对妇女社会解放话语的全面唾弃。于是，在强调女性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同时，相对忽视女性作为社会历史中人的价值。其实，作为历史中存在的人，其社会身份的组成部分来自一系列的范畴，“社会身份这个概念，作为多重互不相同甚至互相对抗的文化结构（如种族、族裔、阶级、自然、性别、宗教、移民的原籍等等）的交叉点，表示的是某种多因素所决定的多重主体位置。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结构中自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所占据的位置包含很多种地位，其中每一种地位又会由于同其他地位的交叉而产生某些微妙的变化”[2] (p. 431)。如果说过去用政治、阶级身份遮蔽、压抑性别身份，用社会存在遮蔽自然存在，而无法建构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那么，现在，将女性的自然性别存在当成女性存在的全部现实，已然又从相反的方向再次跨入这一谬误。

众所周知，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不

<sup>①</sup> 其实，从20世纪50到70年代，文化象征系统一直在塑造英雄形象。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为何到头来却痛感男子汉缺失，竟要从一个异国的影片中去寻找男子汉的样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它表明主导意识形态规制下的革命英雄与人们心目中的男子汉并不是一回事。革命英雄是集体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强调的是个人超常的品质对民族国家集体主体的意义。革命英雄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民族国家、革命集体的成员，此外任何其他身份都是非法的，包括性别身份。参见王宇《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sup>②</sup> 与“寻找男子汉现象”相伴生的是，由于“男子汉”缺席，大批大龄女青年徘徊于婚姻的门槛外，成为当时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还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专门讲话、批示。反映这一社会问题的话剧《寻找男子汉》演出的轰动一时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受到社会关注程度。

再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或者直接从早期的法国启蒙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中汲取灵感,依“托古改制”的方式,呈现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人道主义思想面貌。西方启蒙主义中的科学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成为80年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普泛性的世界观。因此,西方现代文化从心理科学、生理科学的角度对性别的表述为新时期文学的性别关怀提供知性前提。当时,涌现了许多阐述女性特点的科学书籍,其思想资源往往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心理、生理科学理论对女性的论述(以弗洛伊德理论为代表)。例如,认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女性重感情、擅长形象思维、更带有主观性,而男性重理性、擅长抽象思维、更客观性;女性是肉体的、温柔的、依赖的,而男人则是精神的、勇猛的、独立的,等等。西方现代主流文化中固定化的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规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科学论述”的基础上。这些以科学的面目、知识的形态出现的关于男性、女性的论述貌似客观而实际隐含着深重的男性中心霸权机制。“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3](p.228),“在西方中世纪以来一直把这种权力的效应赋予科学以及从事科学话语的人”[3](p.220)。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关于性别差异的话语所构筑的正是曾经桎梏欧美妇女精神生长的“女性奥秘”。<sup>①</sup>英美主流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输出显然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化本文中的性别表述。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的重要特征。当然,这样的影响也是基于上面我们提到的文革后本土文化语境对性别差异的强烈期待。

这里还应该提到不太被人注意到的历史背景。20世纪的50—70年代,虽然在文化层面上消弥了性别差异,但有关性别差异的信息还是可以通过医学知识传达出来。例如50年代初《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报》等杂志上上断断续续地开展青春期生理卫生、发育、健康、生育、体育等知识的介绍、传播。<sup>②</sup>当然,这一时期科学领域中的性别知识并没有获得恰当的文化表述。这样一来,无形中科学领域性别知识就成了人们对性别的全部

理解。这实际上也为当性别差异重新得到强调的新时期之初,文化象征系统将性别差异看成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化生理特性提供了一个不为人觉察的潜在知识背景。

综上所述,如果说正是对人的存在的生理现实的重视导致了性别差异在新时期文化语境中的浮现,那么,也正是这样的浮现路线先在地、宿命般地决定了新时期文本表述性别的本质化路径。而这一切又与世界妇女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密切相关。

## 二、“女性意识”:一个尴尬的能指

在世界妇女运动中实际上一直存在“求同”“求异”两种倾向。求同一派认为妇女运动的目标就是要争取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做与男人一样的事;求异的一派则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妇女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一派承认妇女的特性,同时给予这个特性以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尽管两种观点常常共时性地存在,但从世界妇女运动发展趋势而言,早期的妇女运动偏向求同,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妇女运动偏向后者。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对性别“生理决定论”猛烈冲击曾导致完全无视性别形成的生理因素的倾向,因而70年代后半叶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从正面强调女性的生理特质,推崇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文化和价值观。这一思潮带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这一思潮在80年代初的英美世界是很有影响的,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有力颠覆。不难看出,这两种思想倾向隐藏着两种妇女解放的歧途。第一种,抹煞性别差异,追求与男人一样、以男性为标准(实际上是类男人、准男人),使女性丧失有别于男性的主体意义。第二种,对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乃至本质化,又极易造成传统女性角色意识的借尸还魂,致使女性再次沦为客体。与这两种歧途相对应的是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这一性别的两种模塑:“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4](p.16)不幸的是,这两种歧途、两种模塑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性别语境中也宿命般

<sup>①</sup>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真理、知识的面目出现的英美主流文化关于女性性别本质化的定义曾遭致英美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例如,60年代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70年代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都是其中相当有影响的著作。60年代美国自由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自传体长篇小说《钟型罩》就是揭露所谓的“女性奥秘”对女性精神自由的桎梏、绞杀,这本书问世以来在西方读者中反响巨大,被誉为“女性的《麦田守望者》”。

<sup>②</sup> 如《新中国妇女》(即1949—1955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1951年1月号上开始开辟“妇女卫生知识讲话”专栏,1952年1月号上发表《注意锻炼身体,做一个健康的新妇女》,1953年8月号上发表《健康第一,反对束胸》等等文章。

地接踵而至。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走的是求同的路径,而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话语实践则陷入求异、本质化的局限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前期,人道主义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话语实践(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创作实践),根本无法对“性别差异”作出知性的表述。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大量引进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取代人道主义成为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恰恰又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本质主义的思潮框架内(比如埃莱娜·西苏、伊瑞格芮的理论对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广泛、深刻的影响),<sup>①</sup>性别本质主义的思想倾向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性别文化语境中是极易找到生长的土壤的。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女性意识”这个概念应运而生。这个概念的诞生无疑是有意义的,它敞亮了长期以来被“男女都一样”这一主导意识形态妇女解放话语所遮蔽的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生存状况。“女性意识”在这个概念的提出者那里也有着明确的所指,即“女性作为一个独特性别群体的社会主体意识”。这对建立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无疑至关重要。但是,把“女性意识”作为女性主义话语的“核心能指”又必然导致将性别差异作为这一话语的根本基点,那么,陷入我们上面提到的第二种歧途似乎就在所难免。加上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对“女性意识”这个概念的特殊期待,终于使这个概念不仅日益丧失其产生之初针对男权文化的同化、遮蔽的反抗力量,而且其能指也与其原初的所指分裂,在男权文化的期待视野中渐渐滋生出负面意义。“女性意识”更多地被理解成是“对自然性别差异的意识”。“女性意识”中的社会主体意识渐渐被抽空,而性别的独特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强调,并被本质化。“女性意识”渐渐等同于本质化的“女性气质”,甚至被窄化、矮化为“女性气质”、“女人味”、“做女人”,等等。而“女性气质”、“女人味”、“做女人”这些在80年代新鲜出笼的“能指”与传统男权秩序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思,相反的,前者在相当程度上挪用、复制了后者的一些文化表象,比如在许多文化想象中,“女性气质”被等同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角色规

约。女性的独特性(差异性)得到了强调的同时,对差异性的文化表述中所隐含的权力等级关系也不断升级。[5]

20世纪80年代的性别语境就是这样的吊诡,“80年代文化强调差异,事实上是男权文化得以重建并复权的开端,但它同时成为女性群体得以获得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契机。只有当女性作为一个差异性的群体重新聚集、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返身去考察‘平等’的表述之下掩盖着的不平等的现实”[6](p.179)。于是,一方面,“女性意识”、性别差异成为建构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自我的核心能指。另一方面,“女性意识”、性别差异由于其“所指”的含混,又重新“询唤”着传统女性的性别角色。

而这一切与社会象征系统对男子汉气概的强烈诉求形成深刻互动,抑或正是社会象征系统对男子汉气概的强烈诉求造就了“女性意识”这一概念的所指暧昧化、含混化。因为只有借助本质化的女性,才有可能塑造本质化的男子汉,只有借助客体化的女性才能重建被革命、国家意识形态中断已久的个体男性的主体身份。<sup>②</sup>

### 三、女性主义话语最初的困惑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象征系统中,新的性别秩序悄然重构,这样的重构在当时的语境中已然具有了强大的历史与逻辑的合法性(“重续”“重建”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话语动机),在人人道主义思想脉络上萌生出的女性主义话语根本不可能去质疑这样的重构(犹如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甚至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话语自身也在不期然间为这样的重构提供重要的象征资源。

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第一只报春的燕子的《致橡树》,事实上就是以言说性别差异来建立自己的性别精神立场,“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像刀、像剑,也像戟”的橡树与满树“红硕花朵”的木棉象征着建立在差异前提下的男女平等,这样的性别理念对于文革刚刚结束、还徘徊于长期以来无视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惯性中的读者而言,其新鲜的意义就可想而知了。

<sup>①</sup>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差异的背景下, feminism 一词被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翻译成“女权主义”。

<sup>②</sup>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空间中,尽管国家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具有父性的特征,但作为个体的男性并不能从性别的意义上分享这一威权。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男性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被中断了。参见王宇《新时期之初的男子汉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同样的,张辛欣《我在那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方舟》等这些在新时期初文学中最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文本,也不约而同地表现性别差异,她们还敏感到性别差异/女性独特性与女性主体性诉求之间无法重合的困惑,但这种困惑并没有导致叙事对本质化的传统性别模式的质疑,叙事只是自发、不自觉地表现了传统刻板的性别模式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压迫,这被叙述为(同时也被读解为)做人 与 做女人 两难的冲突。

《我在那儿错过了你》中的“我”是一个主体意识强烈的女性,但这种主体意识并非性别主体,而是无性化的主体,是长期以来无视差异的男女平等话语的产物。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结识了一个被“我”认为是“真正的男人”的“你”,并爱上了“你”。“你”对“我”敬佩、尊重,但不喜欢“我”身上的过多的男性气质——一个准男人。作为一个“真正男人”,“你”喜欢的是“真正的女人”,于是,“我”开始按照“你”的期待来塑造自己,放慢走路的节奏,降低说话的音调,和“你”说话时压抑自己的个性,尽量使自己变得温柔、体贴、含蓄、文静……这一切全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女子”。以博得“你”这个“真正的男人”的青睐。但在关键时刻,“渗入我天性中不肯轻易低头的血性冒了上来”,致使“我”终于错过了“你”。“我”为这样的错过而深深地忏悔。小说正是一篇女性冗长而感伤的内心忏悔。主人公实际上面临女性身份的双重镜像,社会所要求中性化的主体——类男人、准主体。男人所要求的“真正的女子”——客体、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一种镜像意味着一种性别主体的迷途。主人公最终选择第一种镜像,拒绝了第二种镜像——成为一个男人所要求的“真正的女子”,因此而错过自己心爱的男人——“你”,并为此感到深深遗憾。可见,在主人公和叙事者的心目实际上也认为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女人的标准。虽然主人公最后放弃践行这个标准,但还是认同这个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判定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子”,小说的感伤基调不仅仅源自“我”错过你的遗憾,也源自“我”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子”的遗憾。

同样的遗憾也存在于张洁颇具反响的中篇《方舟》的女主人公身上。梁倩对千娇百媚的钱秀瑛又恨又羡慕。内涵丰富、事业有成的梁倩所以对浅薄、依附男人的钱秀瑛产生怨慕心里,是因为梁倩认为钱秀瑛才是真正的女人,而自己不是,她

觉得这是自己生命中的缺憾。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女性主义文本对当时文化象征系统所认可的模式化的男子汉气概的认同。《我在那儿错过了你》中“我”所心仪的“你”,既不像黄云的丈夫那样实惠、会过日子,也不是像李克那样四平八稳、毫不强悍,而是从内心到外表都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身上有一股“强悍、坚实的力量”,目光内含“自信和威慑力量”,“敦实的身材,宽宽的肩,短短的平头,一张线条饱满的脸”,就连“你”所钟情的事业也是充满阳刚气的航海事业。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代替离去的父亲给“我”依靠。《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女主人公虽然厌恶“孟加拉虎”似的男主人公弱肉强食的生存哲学、将妻子“绑在他的战车上”的霸道,但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男子汉气概,这是她的另一个追求者、体贴细致的亚光所无法企及的,也正因此,她虽然一再被伤害却总也无法摆脱对“孟加拉虎”式的男子汉气概的依恋。相比之下,《方舟》中的真正男子汉形象似乎更加完美,老支部书记安泰不仅德高望重、气度非凡,“有一种威慑力量”,同时还非常痴情,年逾花甲依然执著追求爱情。

对性别本质化建构,其实是男权文化的一个诡计。它支持了对女性僵化、低劣的文化定位并使这种定位获得科学支持——再也没有比为一种意识形态提供生物学的依据更能证明其合法性的了。克里斯蒂娃指出:“过分地强调‘男’‘女’之分是近于荒谬的……虽然我承认凸现女性的身份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但我还是要指出:较深入地来看,‘女性’终究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它与其他事物之间有着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sup>[7]</sup> (p.157)事实上克里斯蒂娃就是在强调女性的多重主体位置及其彼此之间的互相关联性,反对将女性的性别身份非历史化、本质化。对性别身份的本质化建构,同样不利于男性,“在男女间界定一条鲜明的界限会加剧男性对被看成有女性味的恐惧,而这无益于改变现状,因为它强化了男人对男性刻板模式的迎合”<sup>[5]</sup>。这样的迎合对男性主体的成长同样是一种桎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性别的解剖现实,“生物性固然事先规范出若干事实,但这些事实受到什么样的诠释,毕竟是社会根据它自身的目标来决定的”<sup>[8]</sup> (p.375)。性别、性别差异只是生理现实的社会建构。我们承认作为性别群体的男性、女性之间的差异(否则,将无法实现女性这一性别的独特价值,重又回到“男女都一样”的时

代),即通常所言的性别差异,但也要承认性别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即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由于其他种种社会身份而导致的差异。不能把性别群体性间的差异绝对化、本质化,从而成为宰制个体行为的霸权模式。福柯主张用谱系学方法研究局部知识来对抗整体统一的总体性知识的意义正在于此。

#### 四、结语与余论

通过上面三个部分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新时期之初,文学沿着人性关怀的路线必然延展至对性别差异的关注,女性独特的境遇、经验历史性地出场,营造出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浪潮;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出场路线又先在地、宿命般地决定了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与生俱来的具有本质主义化的潜在倾向。尽管构成第一波女性主义话语潮流主体的张洁、张辛欣的文本敏感到本质化的刻板性别模式/制度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压迫,但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让她们去进一步质疑、挑战这种刻板的性别模式/制度。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取代人道主义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话语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话语原初的宿命以及这一话语所置身的80年代以来的本土性别文化语境,恰恰又决定了它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更倾向于接受本质主义即求异派的思想观念,甚至一些并不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被进行了本质主义式的误读。80年代中叶以后的女性写作格外强调女性的独特性、差异性,以“异端”“他者”的形象来挑战男权文化,如翟永明《女人》组诗中的“黑夜”意象(这一意象后来广泛出现于女性主义文本中的),90年代初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私人化的写作、身体写作,等等。但是,女性自诩、自塑的“异端”与“他者”形象与男权文化所定位的“异端”与“他者”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在女性的自我表述与被表述中,这两者常常被有意无意混为一谈。这样一来,原本在西方女性主义语境中具有挑战性、解构性、批判性的性别精神内涵的“异端”

“他者”形象,便迅速堕落、畸变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他者化、客体化的角色定位。90年代女性文化空间中充斥的小女人散文、“宝贝”式的身体写作,正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平心而论,这类写作除了商业噱头之外,在相当程度上是知性认识上的含混。这样的消极倾向在90年代中叶以后有所改观。1995年北京世妇会前后,80年代后期以来流行于欧美女性主义学界的核心概念“gender”<sup>①</sup>一词被引入中国的女性主义学界,它被翻译成“社会性别”<sup>②</sup>,用来取代中国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女性意识”。“gender”一词带有反本质主义意味,抵制性别身份的生理决定论,更强调性别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这个概念很快被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接受,文学界由于“女性意识”的惯性,对这个概念的接受相对滞后,但到了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性别研究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界女性主义话语的理论实践中,女性文学研究也开始向性别文学研究转型,本质主义倾向得到有效的遏制,女性主义话语的理论实践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在女性主义话语的创作实践中,本质主义的倾向却依然在蔓延。当然,对其中原因的探究,那已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 参考文献:

- [1] 汪晖. 死火重温[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2] 苏珊·弗里德曼. 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A]. 王政, 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3] 福柯. 权力的眼睛[M]. 严锋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李银河. 女权主义围绕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A]. 中国女性文化(第2辑)[C].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 [5]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J]. 妇女研究论丛, 1997, (1).
- [6] 戴锦华. 犹在镜中[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9.
- [7] Julia, kristeva. “An interview with Tle Quel,” in *New feminisms*. eds. Elaine, Marks & Isabelle, de Courtivr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 [8] 罗思玛莉·佟恩. 女性主义思潮[M]. 刁筱华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6.

(责任编辑: 素微)

<sup>①</sup> Gender一词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参见谭晶常、信春鹰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45页。

<sup>②</sup> 考虑到汉语构词的特点,一些学者,采用“性别”这个词作为gender的汉语对应词,但是在“社会性别”意义上使用“性别”这个概念,其所指与“社会性别”完全相同。本文作者就采用这种方法。